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圈的构建^{*} ——基于汇兑层级体系的分析

马建华

内容提要:经济体间市场网络层级体系的形成是近代市场扩展、经济转变、市场整合度等多重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学界一般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贸易网络已渐具规模,且内部存在不同层级。相较于近代中国国内商品流通层级性的形成,资金流动下金融网络层级性的构建和表现,自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梳理总结国内汇兑市场中重要商埠的主要汇兑关系,大体描绘以上海为中心,以天津、汉口、镇江等一级汇兑中心为节点,连接次级商埠和基层市场并逐步形成立体型的汇兑层级体系。汇兑体系的横向纵向连接,又形成了复杂的全国汇兑网络。从宏观角度看,近代中国的区域金融圈表现明显,空间距离极大地影响全国的汇兑关系,长距离汇兑关系还较少,全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和传递性还是以区域为中心的。

关键词:内汇 汇兑中心 汇兑层级 汇兑网络

一、引言

经济体间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代表着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传统社会经济中,商品市场自然是各地经济体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体现。目前学界已从多个视角论证和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贸易网络的存在及其内部多等级、多类型的层级性。^①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区域经济理论界定经济区域的重要尺度主要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资源市场和人才市场所形成的网络。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常伴随并依赖于资金的融通。资金市场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血液,与商品贸易流通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市场自身的演进过程中,资金是最易于流动的生产要素。资金流动状况决定着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效率。近代中国国内外贸易的繁盛既依赖于货币金融的流通,其本身也促进了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而金融市场如何通过其机构的设置和资金的调拨,实现资金的运转和循环,自然应成为经济史的研究议题。相较于近代中国国内商品流通层级性的形成,资金流动下金融网络层级性的研究成果较少。^②近代化的市场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和完整的组织,市场发育不仅是市场交易

[作者简介] 马建华,上海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讲师,太原,030006,邮箱:majianhua19850131@163.com。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货币兑换、国内汇兑和资金流通效率视角下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与融合研究(1860—1935)”(批准号:16CJL005)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 [美]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405页;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12、14—15页;戴鞍钢:《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架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② 马俊亚:《近代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一翔:《论长江沿岸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一翔:《从资金流动看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改革》1997年第3期;徐建国:《近代民信局的寄递网络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

量、交易范围、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的变化,金融等行业的市场也应有相应的发展。^①从金融市场发育和金融结构层级体系的构造角度来考察近代市场的发育,是探讨近代经济结构和实际运行情况的又一视角。

传统市场向近代市场的迈进过程中,金融在市场发育中的作用逐渐扩大。因币制不统一、平码相异及各地商情复杂,汇兑不通金融受阻。以货币兑换行市为基础,伴随埠际贸易结算兴起的内汇,作为代替现银运送而代理结算埠际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集汇兑、结算、信贷三者为一体的埠际资金调拨方式,直接关联埠际商品的流通贸易。汇兑是除现银运送外,资金流动的另一种主要方式,代表资金在异地间的流动途径,体现不同商埠间金融网络的构建和形成过程。近代中国以上海为中心,通过各地申汇市场将重要商埠连接起来,并逐步形成资金融通的国内汇兑网,使商埠间款项划拨畅通无阻。汇兑层级体系是金融网络放射与回归的一个子集,一定程度上代表区域内的金融市场体系构建,体现金融网络的层级性、立体型,是研究近代埠际金融网络构建的一个视角。内汇以上海为中心,通过各地钱业市场将重要商埠连成一片,使商埠间款项划拨畅通无阻,是旧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中国金融市场中长期占据着主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汇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国国内市场发育程度的标志,也是考察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银行周报》等重要经济类期刊杂志曾刊登并介绍了有关国内汇兑的相关文章和大量内汇行市行情信息,成为今天研究内汇市场的重要资料。同时期,曲殿元、杨荫溥以论著的形势较为详实地分析了内汇的研究意义、汇兑形式及换算举例;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以资料汇编的形式编录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庞杂混乱的市场货币和各商埠的虚拟银两本位;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洪葭管、杜恂诚等在论述近代中国各地金融市场时,简要提及内汇市场在各地的发展历程,论述粗略笼统。^②相较于近代金融市场中股票证券、外汇等市场的研究,学界对内汇市场的研究相对薄弱,已刊论文较少且相关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相对欠缺,缺乏系统性研究。^③本文拟以埠际城镇为节点、以近代中国埠际之间的汇兑关系为切入点,描摹层级性金融市场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其表现,将整个国内金融作为一个中、宏观的系统网络予以研究,构建和勾勒近代中国金融网络的空间结构关系。

二、指标的选取:直接汇兌行市

晚清至民国时期,各大商埠开埠以后,国内外贸易获得极大发展,洋货和土货往来流转于各大商埠。近代银两制度的存在,因各地使用的平(秤)、成色标准及商业惯例的不同,以及银两与银元间的兑换,使得货币在各地的流通交换和换算成为重要的问题。伴随着埠际贸易的发展繁盛,各地通用货币在流通过程中,需要经过货币兑换,即换算成通用平码所表示的银两,才能参与国内各埠的直接和间接汇兑,实现商品和资金的流通。各埠通用货币千姿百态,通用平码各有差异,货币兑换行市以及商业习惯不同,国内汇兑市场随之产生。内汇种类,按不同分法有几种不同形式。其中,依汇款地域的双方或多方关系,分为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直接汇兑指两地之间有直接汇兌行市,可直接依行市清算债务。如果两地之间没有直接通汇业务,必须借助于两地之间的公共通汇地行市,间接计

^① 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 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版;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上海:黎明书局1931年版;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历史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洪葭管:《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北洋政府时期》第3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李一翔:《论长江沿岸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一翔:《1922—1931年重庆申汇市场的变动趋势》,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石涛:《汇兑、结算与投机——近代申汇问题探索》,《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

算两地行市,如天津和汉口之间必须借助上海来进行汇兑结算。间接汇兑,有时涉及多个商埠的债权债务结算,形成一种三角或者多角汇兑关系。如直隶南部邢台县为皮毛集散地,皮毛店常派人到甘肃收买皮毛而产生货币结算关系,但是邢台和甘肃之间距离相距较远,运现成本和风险都比较高,两地间的借贷关系又不平衡,即邢台有欠甘肃之款,而甘肃无欠邢台之款,没有直接汇兌行市。两地之间的资金结算只能借助天津作为转划地。天津与甘肃没有直接行市,但与西安有行市往来,而西安与甘肃兰州有着汇兑往来关系。所以,邢台皮毛商需派人到西安办理兑款业务:邢台皮毛商人到甘肃办货,并未携带现款,可与在西安用款的兰州钱庄商议,通过兰州的钱庄先付款给皮毛商,皮毛商即写信给在西安的兑款人,付给兰州钱庄西安分行若干银两。此时,兑款人手内实际并无现款,此时又有西安钱庄在天津用款,此时双方商定,西安钱庄交款给兑款人,兑款人即写信给天津有关系之钱庄,付款给西安钱庄天津分行。只是,西安与天津之汇兑,西安常处于逆汇,故在此交易中,西安钱庄需贴水给兑款人若干。如果邢台皮毛商在天津没有存款,则天津到邢台采购皮毛之商人的货款,多付以天津本庄之汇票,邢台皮毛商收到汇票,寄给与天津有关系之钱庄代收,所得之款,补齐钱庄所垫付之款。^① 这个间接汇兑的多角结构图式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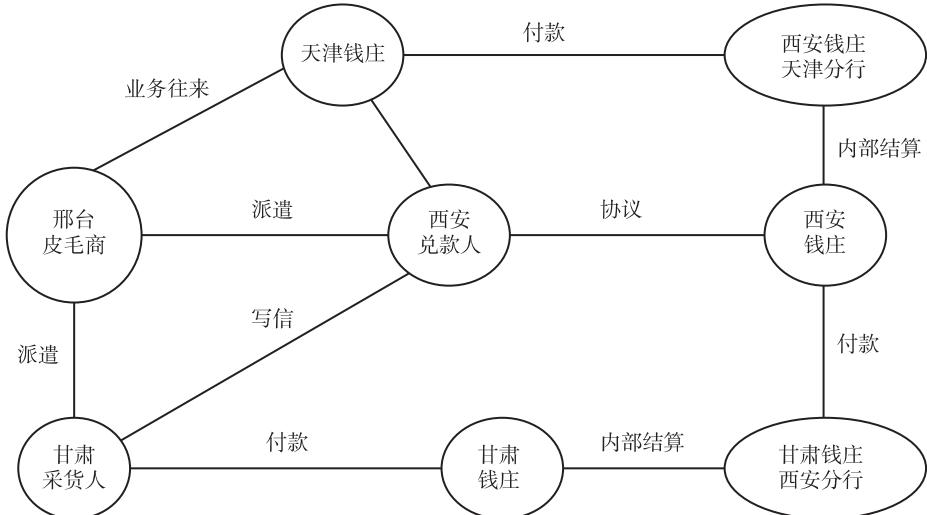


图1 多角间接汇兑结构图例

汇兌行市最直接体现了货币资金的流向和流动路径,体现地域间的经济联系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汇兌层级体系最直接的衡量指标,最直观地描述了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圈形成中的空间集聚程度和形态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因汇兌关系中包含了两地银元与银两行市、两地汇票行市、本地其他通货与通用平码的换算行市等银根松紧、钱市行情及各种用银习惯,体现着各埠传统货币兑换习惯及货币资金集中、调拨和换算、运转流通状况等金融信息。各埠间的通商汇算涉及通货、银平色差、平码的换算及各地的商业习惯用法,决定了各地汇兌关系具有通货圈的地域特征。如保定、张家口、大同、漯河等地申汇公式皆以天津为转划;宜昌、沙市、长沙、贵阳则以汉口为间接转划地;常州、宜兴皆以苏州为转移;扬州、清江浦、淮安则以镇江为划汇之地;成都以重庆申汇市场为标准。汇兌换算构成要素中的洋厘、汇票行市的选择,都是当地或者区域商业习惯和金融联系的反映,是各地直接或间接汇兌的直观表现形式。各地申汇的直接与间接汇兌关系的变化和汇兌体系的形成过程,反映出上海对全国金融市场具有强烈的辐射和回归能力,它既是全国资金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回归点,引导着全国的资金流向。此外,天津、济南、青岛、烟台、镇江、汉口、重庆、宁波、苏

^① 曲殿元:《中国之国内汇兌》,氏著:《中国之金融与汇兌》,第132—134页。

州等内地各埠是这一支流上的各个节点,连接各自转汇区域,形成全国的金融网络的层级性和立体型。

三、汇兑中心及其汇兑区域

申汇,即上海钱庄开出的汇票,流通甚广。各地钱庄都把申汇视为现金筹码。申汇流通汉口、天津、青岛、重庆、南昌、宁波、杭州等重要城市,形成申汇买卖进出的市场交易,即申汇市场。各地钱庄在资金多余时,即在当地申汇市场购入申汇,在资金紧缺时,则售出申汇以回笼资金。各地金融机构、商号只要握有申汇,即等于掌握现金。各地申汇买卖,多在钱庄所掌握的钱业市场中进行,钱庄将申汇作为调剂资金余缺的重要手段。各地银根松紧开始通过申汇得以紧密联结和相互影响。各地钱业市场成为地区资金的调拨者和金融行市的掌控者,行市的上下波动,对资本市场形成调节,使汇票的买卖大体得以均衡,有效促进商品和贸易顺利流通。

汇兑是异地商贸活动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凭借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成为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各埠转口贸易的转运枢纽。申汇市场利用申汇进行埠际间的资金调拨和贸易款项交割,使上海成为埠际间贸易清算中心。上海是当时全国的资金划拨中心,各地之间的汇兑行市,皆以申汇为基础,并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直接和间接汇兑。全国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如天津、汉口、镇江、香港自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金融汇兑中心。另外,重庆、杭州等通商口岸因为土货的出口和洋货的进口,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加强,也成为了重要的汇兑中心。每个汇兑中心,作为汇兑区域中的节点,再与其经济和金融的辐射与影响区域相连,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型的资金结算、调拨和周转网络。上海作为全国资金调拨的中心,通过天津、汉口、镇江等支点,以申汇的买卖和行市变化,将全国重要商埠连成一片,形成覆盖全国的放射性市场网络和汇兑体系,便利了埠际和地区间的资金周转流通。

(一) 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汇兑市场

天津作为华北重镇,京汉、京奉两路全恃天津为调拨,伴随着货物流通和贸易昌盛,自然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债权债务结算中心。天津的直接汇兑地点主要有上海、北京、济南、奉天、营口、吉林,以上各处逐日均有直接电汇行市。但津埠对外汇兑,系以上海为枢纽。^① 北京的汇兑行市多视天津为转移,汇兑区域北去以热河、察哈尔、绥远、库伦为中坚,长江一带汇兑甚少,但沪汇仍占独多。^② 北京每日与天津、上海、哈尔滨、奉天均有直接行市,而其他地区的汇兑则需转汇。如宜昌、沙市等地需由汉口转汇,而东三省各地由奉天、哈尔滨等地转汇。保定当地进出口货物中,棉花、土布多经京津等地出入口,而杂粮、棉纱、煤斤等货物则每年须由津、汴转运入口,“每年春节照例向京津各处置办各货”,^③ 故汇津之款也随之增多,直接汇兑地点主要是北京和天津,其他地方皆以天津为转汇地。且平时金融之宽急,多视京津为转移。石家庄为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相交之处,为山西省省内和河北乐城、赵县等地商品和金融调拨地。当地汇款以天津、太原为多,直接汇兑地有天津、北京、太原等地。^④ 太原对北京、天津、张家口、归绥、包头以及省内大同等地均能直接通汇。^⑤ 山西省银行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的支行及代理处只做汇兑一项,不做其他事务。^⑥ 另外,太原对汉口和上海也可直接汇兑。沪票和汉票则为每汇千元外加汇水5元。^⑦ 大同申汇交易比较有限,无直接行市,各商偶

^① 《天津银钱业合租公库》,《中央银行月报》1932年第1卷第1—5期。

^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1925年印刷,第246页。

^③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10期(1918年3月19日)。

^④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46期(1921年11月29日)。

^⑤ 《太原之金融机关及通货》,《银行周报》第3卷第12期(1919年4月15日)。

^⑥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3卷第3期(1919年1月21日)。

^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326—328页。

有交易，多以天津的申票行市为准。大同对京津汇兑，则恒视银元涨落而酌价，并无定例。大同直接汇兑地点包括北京、天津、太原、张家口和包头等地。^① 张家口与天津、北京、归绥、包头均有直接行市。而张家口规元交易无直接行市，须以津市申电汇行市及本口津汇行市共同计算，即张家口对沪汇兑须以天津为转移。^② 归绥当地商业均在春冬两季，买卖以皮毛为大宗，当地汇兑关系主要有京津及太原、包头、张家口等地。包头为我国西北贸易的中心，货物集散之地，我国西北所产之皮毛，均汇集于此转销天津出口，而洋货、杂货也运销至此分销西北各地，^③ 当地汇兑主要包括京津、张家口、归化等地。兰州与上海、天津、西安等地皆有汇兑关系。^④

(二) 以汉口为中心的华中汇兑市场

“汉口居长江中流，为南北通衢，商业繁盛，百货荟萃，但贸易金融全恃上海为调拨，故汇兑市价与沪市最为密切。”^⑤ 汉口金融市场一方面受到上海金融市场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其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影响着湖北全省和邻近各省，成为内地的金融中心。汉口的直接通汇地包括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昌、宜昌、沙市、重庆、成都、万县、长沙、常德、开封、洛阳、信阳、许州以及其他商埠省会，汉口汇北京、天津均须由上海转汇。沙市当地对外往来除上游的宜昌、万县、重庆直接往来外，下游各埠均由汉口出入。故沙市直接汇兑地包括汉口、重庆、宜昌和万县，行市有汉票和渝票。^⑥ 沙市当地汇兑以汉口最多，且申票交易以汉口为对外转汇区域。但1927年后因汉口现金封锁，沙市申汇遂由上海直接收解。^⑦ 宜昌为长江上下游货物转输必经之地，当地出口货物多转运汉口。宜昌对汉口、沙市、重庆、万县以及长江下游各埠均有直接汇兑关系。直接行市包括汉票、沙票。其对沪汇兑，多经汉口转汇。^⑧ 老河口为湖北光化县治所在地，水陆可达汉口，陆路交通达沙市等地。^⑨ 直接汇兑地有汉口、沙市等。当地无行市，银元等市价以汉口市价为准。长沙直接汇兑地点包括汉口、常德、衢州等地。其与上海之间的汇兑，须以汉口为转汇。^⑩ 常德与汉口、长沙等地有直接汇兑关系。汉票、长洋汇有直接行市。^⑪ 汇水依长、汉两地行情，上落不定。^⑫

九江作为江西省省内货物、进出口货物来往转运要道，汇兑仅沪、汉二处有直接行市，其余皆通过汉票和申票进行转移。^⑬ 吴城直接汇兑地点有南昌、九江、上海、汉口等地。吴城对汉口和上海皆有直接汇兌行市，申票例期每月十四及月终为期，汉票例期每月十五及月底为期。^⑭ 南昌与上海的规元、汉口的估平皆逐日有直接行市，其他各埠均以申、汉行市为换算标准。^⑮ 河口与上海、杭州、南昌等地都有着直接汇兑关系。当地有规元、杭汇以及南昌通用洋行市，即河口与上海、杭州、南昌皆有直接行市。^⑯ 抚州的直接关系汇兑地点有上海、汉口、南昌及福建省内各埠。绸缎杂货等业在春季进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篇“商埠及重要市镇”第2章“大同”，1933年印刷，第82(丙)页。

^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275—277页。

^③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4卷第31期(1920年8月24日)。

^④ 《各地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1—6期。

^⑤ 李炳堂：《汉沪汇兑述要》，《银行杂志》1923年第1卷第2号。

^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0—409页。

^⑦ 谢也青：《沙市金融状况之过去及现在》，《汉口商业月刊》1934年第1卷第7期。

^⑧ 《宜昌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18期(1918年5月14日)。

^⑨ 陈祖煌调查，张文伯编辑：《湖北老河口之经济状况》，《中央银行月报》1933年第2卷第1期。

^⑩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19—424页。

^⑪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24—428页。

^⑫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辑：《常德县之工商业现况》(廿三年四月调查)，《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18期(1934年9月15日)。

^⑬ 《九江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3卷第10期(1919年4月1日)。

^⑭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223—227页。

^⑮ 《南昌之通用货币及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20期(1918年5月29日)。

^⑯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227—229页。

货时节，多向沪汉采购，需款则向银行钱庄购买汇票。^① 汇出汇款以闵湘建延等处较多，南昌次之。汇入汇款以南昌为多。^② 樟树镇当地的直接汇兑地点有上海、汉口、九江、吴城、赣州、吉安和南昌。其申票、汉票行市皆以南昌行市为标准，规元例期十五天。^③ 吉安各业往来，向以南昌为总汇，故对南昌汇款较多，上海、汉口次之。^④ 而吉安的申票、汉票行市悉以南昌行市为转移。赣州的直接汇兑地点包括吉安、南昌、吴城、九江、上海、汉口等地。当地行市有申票、汉估、吴票、南昌票、吉安票等汇票行情。周家口直接汇兑地点包括汉口、漯河、郑州。当地行市如遇交易，则以汉口市价为准。^⑤ 信阳直接汇兑地点有汉口、郑州、许州。交易概以银元为主，如以洋兑银则随汉口行市而定。^⑥ 光州只与汉口有直接汇兌行市，本地交易概以银元为主，如以洋易银则以汉口市价为标准。^⑦

(三) 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汇兑地区

香港直接汇兑地包括上海、广州以及英美日等国。但香港与天津、汉口、镇江、奉天等内地各埠汇兌行市，须以港纸行市（港纸每元与规元间的比价）和各地申票行市为换算转汇，即上海是内地各埠与香港之间的转汇地。南洋汇款也经由香港转汇厦门等地。^⑧ 厦门汇兑，向以南洋和香港、上海为大宗。^⑨ 广州惟上海、香港两处有直接行市，其余均由上海行市转计。^⑩ 汕头直接汇兑地点包括上海、香港、广州、福州和厦门。行市有申票、香票等汇票行情。但汕头香港、上海汇票行情涨落，向以港埠申电行情为标准。申电之起伏，又以世界银价贵贱为转移。^⑪ 福州的直接通汇地有上海、香港、厦门、汕头和广州，其中上海、香港逐日均有直接行市。福州汇兑起伏行情全视港埠申兑高低为标准，港埠申兑看涨，则福州港汇随之亦高。^⑫

(四) 以苏浙为中心的长三角汇兑市场^⑬

江苏、浙江两地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和汇兑所分布最为密集，通汇区域延伸较广，各大小商埠几乎皆可通汇。

1. 以镇江为主的汇兑中心。浙江地理位置紧邻上海，经济金融联系也相对活跃。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浙江宁波、绍兴、杭州等城市有了钱业公所和钱业市场的存在。清中叶前后，浙江和苏南各地钱业市场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金融市场圈。其中，上海、宁波、绍兴、杭州和苏州等5个城市逐步发展成为中心市场，附近城镇的钱业市场行市都以这5个城市为准。其中，以镇江为中心的汇兑区域包括盐城、东台、泰县、扬州、徐州、淮安、安徽寿县、正阳关、清江浦（青浦、板浦又以其为中心）和芜湖（庐州以其中心）。

镇江与南通、扬州、泰州、东台、姜堰、溱潼、盐城、兴化、海安、清江、淮城、宝应、汜水、界首、高邮、十二圩、六合、仙女庙均能直接汇兑。镇江除与上海和汉口有直接汇兌行市外，其他地域皆以上海为转移。如其汇广东，以镇规元行市和申毫洋行市为转移，即以上海为转移。^⑭ 盐城与上海、淮城、南

^① 《各地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1937年第6卷第2号。

^② 《各地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1938年第7卷第10号。

^③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233—236页。

^④ 《各地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1—6期。

^⑤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45—447页。

^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48—449页。

^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52—453页。

^⑧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6卷第1期（1922年1月3日）。

^⑨ 《各地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1933年第2卷第1期。

^⑩ 《广州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26期（1918年7月9日）。

^⑪ 《民国九年汕头之金融概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6期（1921年2月2日）。

^⑫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8期（1921年3月8日）。

^⑬ 本文所分析的长三角指的是广义的经济圈，而非地理行政概念。

^⑭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56—66页。

京、清江浦、镇江、扬州、通州、宝应以及临近各县均有直接汇兑关系。盐城与上海间的汇兑，参照镇规元行市进行计算。东台直接汇兑地点包括上海、镇江、扬州、樊川、仙女庙、泰县、姜堰、南通、如皋、白蒲、海安、盐城、阜宁、兴化、邵伯、高邮、淮安、清江浦、宝应等处。当地行市包括洋厘和申汇行市，但申汇行市是参照镇规元行市进行折算，即先将本地扬二七宝银折合成一定数目的镇二四宝，再按照镇规元行市进行汇兑。^① 泰县与镇江、扬州、东台、盐城等地有直接汇兑关系。泰县洋厘进出，皆照扬州行市。而买卖规元则全由镇江进行调拨，故行市高低概以镇元为标准。由泰汇申例期为见票迟十三天。扬州与上海、苏州、无锡、南京、镇江、九江、汉口、芜湖、南通、泰州、东台、盐城、清江浦、淮安等地皆有直接汇兑关系。本地行市有规元行市。当地买卖上海规元，须以镇江规元行市折合（先以本地银折合镇银之数，再采用镇规元行市）计算。^② 六合与上海、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皆有直接汇兑关系。如汉口、九江、芜湖、苏州等地的汇兑均由南京、镇江转汇。六合市面无行市，其与上海之间的汇兑皆以镇江规元市价和洋厘市价为标准。当地规元例期兑出迟十天，收进迟三天或五天不等。^③ 徐州与上海、天津、济南、南京以及其他各大商埠均有直接汇兑关系。^④ 当地有直接的申汇行市。^⑤ 淮安与清江浦、扬州、镇江有直接汇兑关系，其他各埠均由清、扬、镇三处转汇。当地洋厘向来根据清江浦、镇江等地的行市为转移。淮安当地向申汇兑，先以淮二六宝折合镇二七宝为本位，再减去镇燥（即升水）两数得镇二七宝若干两，然后以镇规元行市计算所汇规元两数。^⑥ 安徽寿县直接关系汇兑地点有蚌埠、临淮、济南、天津、南京和上海。本地行市全照镇江为标准，并无额外的加项，买卖均照准盘交易。^⑦ 正阳关直接关系汇兑地点有上海、镇江、南京、蚌埠、济南、天津和汉口。本地行市均以镇江为标准。清江浦汇兌除镇江可直接汇兑外，其余悉听镇、沪行市核计。^⑧ 青浦当地无钱庄，更没有公所，也无行市。如行家代客买卖上海规元，均须依照清江浦钱业公所的行情为标准，以钱价匡算再由钱价合成银元进行交易。^⑨ 板浦中国银行是由清江浦支行代转各钱庄的代兑机构，板浦本地的中国银行除与清江浦同行往来代汇外，还可直接由扬州或镇江的中国银行往来代为汇兑。本地钱业同行没有公所，其洋厘和钱价行市均以每日清江浦发来的公电为标准。芜湖通汇地点以汇往上海为最多，京、镇、津、汉等埠次之，其中尤以对沪汇兑为多。^⑩ 芜湖当地行市开镇票和申票。庐州当地直接关系汇兑地点有芜湖、六安以及安徽沿江诸埠。当地没有行市，交易全以芜湖行市为标准。

2. 江浙其他地区。南京与上海、镇江、汉口、南昌、天津、芜湖、蚌埠、徐州、临淮等地有着直接汇兑关系。其与上海、镇江均有直接汇兌行市。南京汇出款以上海最多，汉口、南昌次之，汇入款亦以上海为数独巨，约占十分之九，其他各处数均有限。^⑪ 无锡汇款除上海外，其余各地悉听上海行市转移。^⑫ 松江与上海、杭州、嘉兴、湖州、苏州等地皆有直接汇兑关系，天津、汉口等地的汇兑关系皆转托由上海转汇。^⑬ 太仓与上海、苏州、常熟皆有直接汇兑关系。本地行市有申汇行市。^⑭ 南通与上海、

^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26—133页。

^② 《扬州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38期（1918年10月1日）。

^③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04—107页。

^④ 《徐州汇兑情况》，《中央银行旬报》1931年第3卷第21期。

^⑤ 《徐州银洋及汇兌行市表》（民国廿一年一月中旬），《中央银行旬报》1931年第3卷第2期。

^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15—118页。

^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207—209页。

^⑧ 《清江浦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50期（1918年12月24日）。

^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18—120页。

^⑩ 《芜湖金融调查》，《中央银行月报》1934年第3卷第11期。

^⑪ 《各地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1932年第1—5期。

^⑫ 《无锡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46期（1918年11月26日）。

^⑬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83—86页。

^⑭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93—96页。

镇江、海门、扬州、芜湖、苏州、无锡等地皆有直接汇兑关系。本地汇兑关系中以上海洋汇为主。^① 大通与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以及安徽其他沿江之地皆有直接汇兑关系。本地行市有申汇规元行市。

杭州与上海、苏州、宁波、绍兴均可直接通汇。但直接汇兑以上海为最多,浙杭一带须由上海转汇。其他如嘉兴、湖州、兰溪等地均有对杭汇兑,但在杭州则无对嘉兴、湖州等地的汇兑。^② 宁波与上海、绍兴、温州和杭州有着直接汇兑关系。^③ 行市开规元行市,申甬汇兑例期须迟期3天。^④ 而甬埠金融,向以沪市为转移。^⑤ 余姚直接汇兑地点包括宁波、杭州、绍兴。^⑥ 嘉兴与上海、杭州有着直接汇兑关系。行市包括规元行市。其与其他地方的汇兑,经上海转汇,^⑦ 规元全凭沪市。^⑧ 碌石直接关系汇兑地点包括上海、杭州、南京、芜湖、苏州、宁波、绍兴、嘉兴和湖州。当地有规元行市,其他如天津等地的汇兑,则以上海为转划。^⑨ 湖州直接关系汇兑地点有上海、杭州、宁波、绍兴、嘉兴以及所属各乡镇。湖州与苏州等地汇兑,须以双方对上海的直接行市转划。^⑩

苏州与上海、常熟、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湖州、南浔等地皆有汇兑关系,但直接汇兑以上海为最多,浙杭一带须由上海转汇。宜兴的直接汇兑地点包括苏州、无锡和常州。宜兴当地没有直接行市,其汇上海,则要参照苏州的规元行市和常州的洋厘行市。^⑪ 漆阳与上海、苏州、常熟、常州、无锡、江阴、宜兴、砾石、杭州、湖州、南京、丹阳、镇江等地均有直接汇兑关系。但当地并无行市,规元、洋厘等行市均逐日由苏州拍来电报,参照苏州行市。常州的直接关系汇兑地点有镇江、清江浦、南京、徐州、无锡、苏州、上海、北京、天津、芜湖、汉口、南昌。行市有规元和洋厘行市。常州行市悉以苏州行市为标准,各庄家在钱业公所买卖进出,遵照苏州行市上下。^⑫

绍兴、温州、兰溪、海门、衢州等地汇兑为杭、绍、甬三地的混合汇兑区域。1918年绍兴当地无规元行市,仅开杭汇和甬汇,绍兴沪汇须先进杭洋,由杭庄代收申元,或由宁波代收。^⑬ 到20世纪30年代,绍兴与上海、宁波、杭州都有直接汇兑关系,金融行市也包括了沪汇行情。^⑭ 海门与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皆有直接汇兑关系。当地没有直接行市,交易悉以沪、杭、甬三处为标准,交易例期以即期为多。^⑮ 温州与上海、宁波、杭州、海门都有直接汇兑关系。^⑯ 汇兑行市开申汇、杭汇和甬汇行情。申甬温汇兑习惯迟期五天,即期较少。规元甬汇申汇是根据申洋厘及甬规元以定涨落。^⑰ 兰溪直接汇兑关系地点包括杭州、绍兴、宁波、上海、苏州。^⑱ 当地汇兑关系主要包括杭汇、绍汇和甬汇。^⑲ 衢

^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96—100页。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9篇“金融机关”,1933年印刷,第24—25页。

^③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9篇“金融机关”,第24—25页。

^④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45—149页。

^⑤ 《记杭绍甬之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22期(1918年6月11日)。

^⑥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9篇“金融机关”,第24—25页。

^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52—156页。

^⑧ 《嘉兴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2号(1926年10月2日)。

^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56—160页。

^⑩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9篇“金融机关”,第24—25页。

^⑪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87—90页。

^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66—70页。

^⑬ 《记杭绍甬之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22期(1918年6月11日)。

^⑭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9篇“金融机关”,第24—25页。

^⑮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69—171页。

^⑯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9篇“金融机关”,第24—25页。

^⑰ 《温州商业金融调查记》,《银行周报》第2卷第32期(1918年8月20日)。

^⑱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9篇“金融机关”,第24—25页。

^⑲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46期(1921年11月29日);《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36期(1921年9月20日)。

州当地与杭州、兰溪两地有直接汇兑关系。^① 衢州与上海之间的汇兑，须以衢州和杭州之间的杭江行市以及杭州规元行市为转移。^② 余姚直接汇兑地点包括宁波、杭州和绍兴。^③

(五) 山东及东三省汇兑市场

山东各地的汇兑，以津沪为主。济南、济宁、滕县、周村、益都、烟台、青岛等地均有直接的申票行市。济南与天津、北京、上海、青岛、南京、汉口和烟台可直接通汇，^④ 其中津、沪均逐日有直接行市。^⑤ 济宁汇出汇款以上海为多，济南、镇江、苏州次之，^⑥ 但济宁除上海、济南外均无直接汇兌行市。^⑦ 滕县与上海、天津、济南等地有汇兑关系，与上海有直接行市。^⑧ 周村汇兑以上海、天津、济南、青岛等处为多。^⑨ 益都当地出产以蚕丝为大宗，多直接销往上海。其他手工艺品及农产品的销售之地以及外贸来源之地均在青岛、济南。直接汇兑地包括上海、济南、青岛。^⑩ 潍县直接通汇地包括上海、青岛、济南、天津和烟台，且有申元行市。^⑪ 烟台国内汇兑以天津、上海、济南、青岛、大连等地最盛。^⑫ 青岛各埠汇兑，以上海为最多。大连、天津等处次之。^⑬ 其他间接汇兑多以上海为转汇。^⑭

东三省的汇兑，以上海、天津和山东烟台等地为主。哈尔滨与上海、天津、长春、大连、奉天、营口、黑龙江、海参崴以及黑河皆有直接汇兑关系。其中，哈尔滨与上海、天津、大连均有直接行市。^⑮ 黑龙江汇兑以哈尔滨、天津两处为多，北京、营口、奉天、上海次之。黑龙江与哈尔滨、天津有直接行市。^⑯ 黑河与哈尔滨、奉天均有直接汇兑关系，其余商埠均为间接汇兑关系。黑河与上海之间的汇兑，须经哈尔滨转汇。^⑰ 满洲里当地无行市，交易悉以哈尔滨行市为标准，且与哈尔滨有直接行市。汇兑以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最多，东三省其他地方及天津、北京次之。

沈阳与天津、上海、大连、长春、哈尔滨、营口、安东以及省内外各大商埠均有直接汇兑关系。即沈阳与上海、天津有直接汇兌行市。^⑲ 安东与上海、天津、烟台均能直接汇兑，且日有行市。^⑳ 大连国内汇兑交易以上海银汇为主，烟台、青岛、天津次之。行市有烟汇、申汇行情。^㉑ 营口与天津、奉天、大连、烟台和上海等处均有直接汇兑关系，每日行市开申汇、烟汇和津汇等处汇兑行情。^㉒ 营口与镇江、汉口等地的汇兑，以上海规元行市为转移。长春与哈尔滨、奉天、吉林、上海、大连、天津等地均有直接汇兑关系。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9篇“金融机关”，第24—25页。

^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78—181页。

^③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49—153页。

^④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46期（1921年11月29日）。

^⑤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286—287页。

^⑥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31期（1921年9月20日）。

^⑦ 《济宁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6期（1918年2月5日）。

^⑧ 《滕县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2期（1918年1月8日）。

^⑨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4编“都会商埠及重要市镇”第5章“周村”，1934年印刷，第158(丁)页。

^⑩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316—317页。

^⑪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4编“都会商埠及重要市镇”第4章“潍县”，第116(丁)页。

^⑫ 《重要各埠国内汇兑市价表(续)》，《中外商业金融汇报》第4卷第3期（1937年3月）；《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31期（1921年10月11日）。

^⑬ 《青岛一金融情形》，《中央银行旬报》1930年第2卷第19期。

^⑭ 《内国汇兑计算法(续)》，《大陆银行月刊》第2卷第9号（1924年9月25日）。

^⑮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369—375页。

^⑯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377—380页。

^⑰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380—385页。

^⑱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335—343页。

^⑲ 《安东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5期（1918年1月29日）。

^⑳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348—354页。

^㉑ 《营口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9期（1918年3月12日）。

(六)以重庆为中心的汇兑市场

近代重庆金融市场对西南地区的资金流向具有强烈的辐射和回归能力。重庆地处西陲,为川省货物往来枢纽之地,商贾云集,货物往来贸易,市面现金何啻千数百万,各庄各商彼此苦于往返划拨,故代人专做收交之钱庄等金融机构应用而生。^① 重庆的直接汇兑地点包括上海、宜昌、汉口、沙市、成都、万县、叙府和自流井等地。但重庆对天津、北京、福州、济南、烟台、广州等地皆以上海申票行市为转移。^② 成都因当地工商业不甚发达,各行庄营业向以汇兑为主要项目。成都的直接汇兑地点包括重庆和上海。成都汇汉口,要经过重庆转汇。蓉市汇兑以买卖渝票、申票为主,申票交易相对较少,其价格以渝市申票及成渝汇价为换算标准。^③ 自流井直接汇兑地仅重庆一地。潼川向重庆汇兑情况多为潼交渝收。^④

(七)申、津、汉、渝混合区域

开封的直接汇兑地点包括上海、汉口、济南、天津和郑州。各路调款,仍以上海为主。郑州直接汇兑地点包括汉口、上海、天津、开封、洛阳。^⑤ 此处虽有钱业公所,逐日亦无申、汉、津票行市,仅开钱价,交易无多。^⑥ 查每年汇出款项以京津汉最多,沪汴次之。汇入款项以津、鲁、沪、汉、彰、归等为最多。洛阳直接汇兑地点有上海、天津、汉口、青岛、郑州等地。汇兑有申汇、津汇、青岛汇、汉汇等。^⑦ 周口汇款向以津、汉、汴三处为最多,上海次之,北京又次之。^⑧ 许州即许昌,后为河南的重要商埠之一,其向以汉口为汇兑和资金运转中心。直接汇兑地点包括上海、汉口、天津、郑州、开封、洛阳。漯河当地无钱业公所,也无钱洋行市,每遇交易,均照汉口厘价加以伸缩。铺户往来,亦凭买卖汉票扣其汇水。漯河直接通汇地除汉口外,次之天津、北京、开封,^⑨ 然通盘市面仍操之于汉口。驻马店直接汇兑地点有汉口、天津、上海。本地行市均以汉口为标准。^⑩ 西安与上海、汉口、郑州、天津和兰州有直接汇兑关系,直接行市包括申票、汉银票和汉洋票。^⑪ 安庆的直接通汇地有上海、汉口、镇江、芜湖、九江、大通等沿江之地。^⑫ 但汇兑仅开申票和汉票行市。^⑬ 万县直接汇兑地点包括重庆、汉口、宜昌,直接汇兑行市有渝汇和汉汇。贵阳直接汇兑地点包括重庆、汉口和上海,直接行市亦为渝汇、汉汇。^⑭

四、汇兑体系结构

上海为国内汇兑的中心点,全国重要商埠几乎都与上海有着直接汇兑关系。从各地所开汇兑直接行市可知,镇江、宁波、杭州、天津、汉口、香港等商埠是除上海之外接收各地直接汇兑行市最多的商埠。即津票、汉票、甬票、杭票、港票等汇票是内汇市场上除流通全国的申票外,其他几种具有一定流通范围的汇票。同时,上海、天津、汉口、重庆、镇江亦为几个重要的转汇中心。

^① 《民国六年重庆金融概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12期(1918年4月2日)。

^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65—478。

^③ 《成都金融情况调查》,《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④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1期(1918年1月2日)。

^⑤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32—435页。

^⑥ 桂绍熙:《最近郑州金融商况调查录》,《银行周报》第3卷第14期(1918年4月29日)。

^⑦ 《各地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1932年第1卷第1—5期。

^⑧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36期(1921年9月20日)。

^⑨ 《漯河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10期(1918年3月19日)。

^⑩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450—452页。

^⑪ 《各埠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4卷第7—12期。

^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188—191页。

^⑬ 《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21期(1921年12月6日)。

^⑭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印:《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第529—533页。

北京、石家庄、保定、太原、大同、张家口、归绥、包头等埠汇兑以天津为中心。河南许州、漯河、周家口、信阳、驻马店、光州多以汉口行市为汇兑和资金运转中心。长沙、常德(亦有对长沙汇兑)对沪汇兑须经汉口转汇。九江、吴城、安庆、赣州、南昌开申、汉汇兑。樟树镇、吉安、抚州(另为申、汉)、河口(另为申、杭)又为南昌的汇兑区域。开封、郑州、洛阳、周口、西安汇兑以申、津、汉三方为主。成都、自流井、潼川以重庆为对外汇兑区域。沙市、宜昌、老河口、万县、贵阳对汉、渝皆有直接行市。厦门、汕头、广州、福州等华南商埠以香港和上海为汇兑中心,且上海为香港与内地各埠汇兑的转汇区域。苏州以上海为中心,而宜兴、溧阳、常州又以苏州为中心。镇江当地汇兑以沪、汉为多,其他各埠以上海为转移。盐城、东台、泰县、扬州、六合、徐州、清江浦、安徽寿县、正阳关、清江浦、芜湖、六安等埠皆以镇江为汇兑中心。而新浦、板浦又以清江浦为核心。庐州又以芜湖行市为标准。绍兴、温州、兰溪、海门以申、杭、甬行情为主要标准。衢州开杭、绍、甬行市,但对沪汇兑以杭州为转汇之地。南京、无锡、大通、南通、太仓、松江等地直接以上海行市为转汇中心。山东的济宁、滕县、周村、益都、潍县虽开设票行市,但与济南经济关系密切。烟台、大连、青岛皆有申票行市,且为山东、东北重要的汇兑平台。

表1 汇兑层级体系

中心点	一级汇兑中心	次级汇兑中心	所辖汇兑区域
上海	天津	北京	
		石家庄	
		保定	
		大同	
		太原	
		张家口	
		归绥	
		包头	
	汉口	重庆	万县、贵阳、宜昌、沙市、老河口、常德、成都、自流井、潼川
		长沙	常德
		九江	
		吴城	赣州(亦连接上海)
		南昌	河口(亦连接上海)、抚州(亦连接上海)、樟树镇、吉安
		许州	
		漯河	
		周家口	
		信阳	
		驻马店	
	津、汉、申交叉 汇兑中心	光州	
		安庆	
		开封	
		郑州	
		洛阳	
	镇江	周口	
		西安	
		—	盐城、东台、泰县、扬州、六合等地又以镇江为中心
		徐州	
		淮安	
		安徽寿县	

续表

中心点	一级汇兑中心	次级汇兑中心	所辖汇兑区域
上海	镇江	正阳关	
		清江浦	新浦、板浦
		芜湖	庐州
		六合	
	宁波		
	杭州	一	嘉兴、河口、衢州
		苏州	宜兴、溧阳、常州又以苏州为中心
	杭、甬、绍、苏混合汇兑	一	海门、温州、兰溪、衢州、余姚、硖石、湖州
	香港	汕头	
		广州	
		厦门	
		福州	
		南京	
		无锡	
		松江	
		南通	
		太仓	
		大通	
		大连	
		烟台	
		长春	
		济南	济宁、滕县、周村、益都、潍县(皆有申票行市)
		青岛	
		哈尔滨	黑龙江、黑河、满洲里
		沈阳(奉天)	
		安东	
		营口	
		长春	

由全国重要商埠的直接汇兌行市、直接通汇区域以及转汇中心分析,近代中国国内汇兌存在明显的层级体系。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心点,通过连接天津、汉口、镇江、杭州、香港等一级汇兌中心,并以这些一级汇兌中心为焦点,扩散和连接更基层的商埠,形成一个树状纵向结构。

图2箭头表示全国重要商埠所开直接汇兌行市及转汇中心所在示意,为表示全国各地主要商埠以上海为中心的纵向汇兌层级关系,图2先暂时采用一地所开汇兌行市,以单向箭头表示异地间汇兌关系。实际商贸往来汇兌关系中,资金往来结算往往是双向甚至是三角、多角汇算关系,详见图3所示。各地对上海有申汇行市,上海内汇市场亦有对天津、汉口、镇江、香港、哈尔滨等全国大小商埠、各个层级体系城镇的汇兌行市。资金结算关系随着金融季节,既由上海流向天津、汉口、镇江等一级汇兌中心,再流通到次级汇兌中心及其所属基层市场;亦会由初级市场,一层层流转结算,最后再回到上海。

近代国内汇兌层级体系具有明显的层级性,总体呈树状结构,且汇兌关系错综复杂。从图2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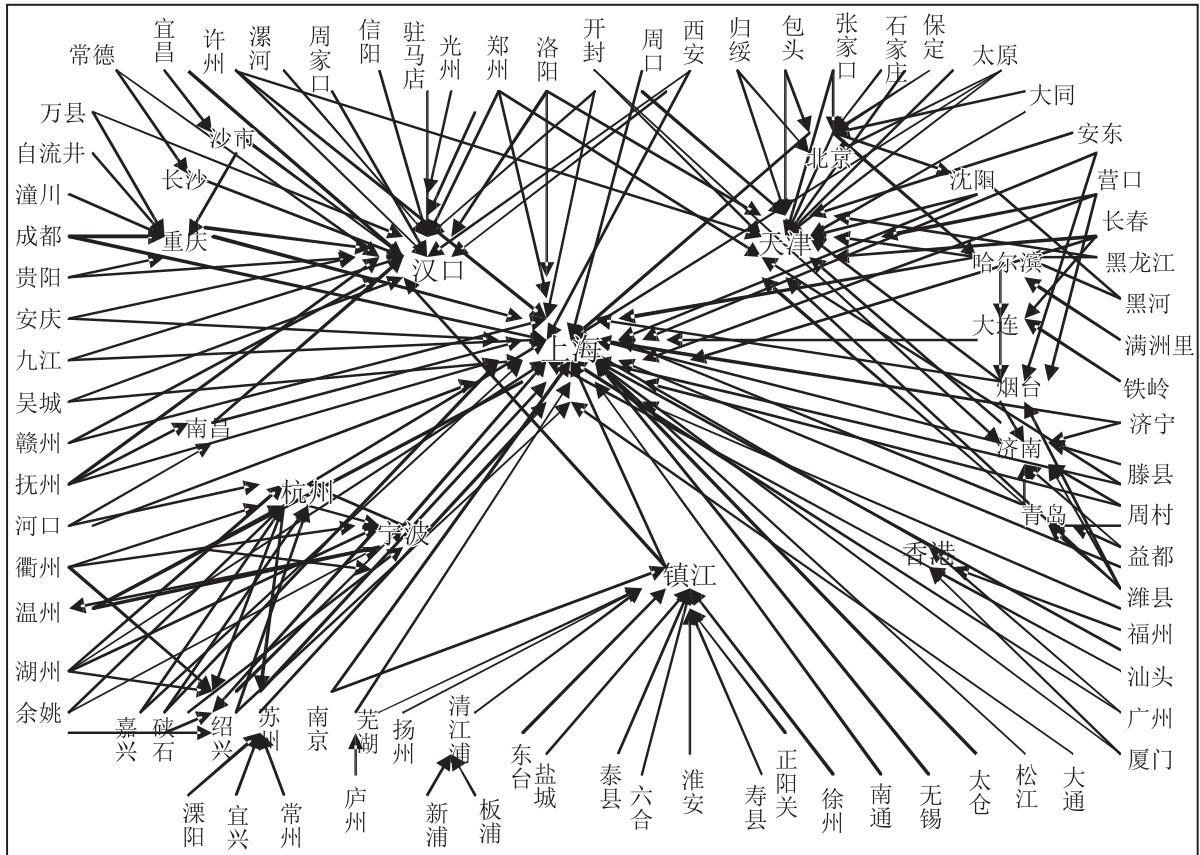


图 2 近代中国国内汇兑层级体系

代中国国内汇兑层级体系看,笔者暂且将国内汇兑分为五个层级体系,上海为中心点,汉口、天津、镇江、杭州、宁波、香港等商埠为一级汇兑中心,北京、沈阳、哈尔滨、大连、烟台、济南、青岛、苏州、绍兴、南京、重庆、长沙、沙市等地为次级汇兑中心。再外围一圈为基层汇兑市场,再次一层为更低级的汇兑点。相较于目前学界以市镇作为国内贸易的物理节点,或者以某种特殊商品贸易路径、某条固定商路对所经地区经济互动等视角对多层次市场结构体系的定论,五级汇兑层级体系的亦是基于埠际间的贸易资金流通结算而形成的网络体系。

图 2 仅直观描绘了国内汇兑层级体系纵向的层级体系,暂时未将各个层级体系中所含商埠之间的横向关系进行连接,若将各地所有直接汇兑区域相连,国内汇兑将形成横、纵向交错,更为复杂的汇兑网络。由于国内汇兑是基于埠际商贸活动流通基础上的资金结算、汇兑形式,各个地方商埠彼此间的商品业务往来,亦会带来汇兑关系的横向连接。汇兑体系的横纵向连接,形成了全国复杂的汇兑网络。本文将每一个发生汇兑关系的通汇商埠进行赋值后,采用 Gephi 软件分析埠际间复杂的汇兑网络,详见图 3。

图 3 所示汇兑网络图由节点(地名)和边(汇兑关系)组成。其中,边的粗细表示汇兑关系发生的密集程度,与中心城市发生汇兑关系越多,线条越粗。节点以不同图形和大小来表示相应商埠与其他商埠间发生汇兑关系的多寡。其中,通过实线圆的大小来体现上海、天津、汉口和南京等中心商埠与其他商埠间汇兑关系的多少。例如,上海用最大的实线圆来表示,主要体现了上海与其他商埠之间汇兑关系最频繁,是全国汇兑关系的中心点。通过虚线圆来表示次级汇兑中心商埠,主要包括宁波、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常州、济南、北京、重庆、营口、大连、哈尔滨、沈阳、九江等。通过矩形来表示基础汇兑商埠,主要包括次级汇兑中心商埠外围的节点。板浦、新浦、庐州等基层商埠离全国汇兑关系中心点上海最远,处于基层的金融市场。即,汇兑关系联系越紧密,相应商埠越在中心区域。从宏观角度看,近代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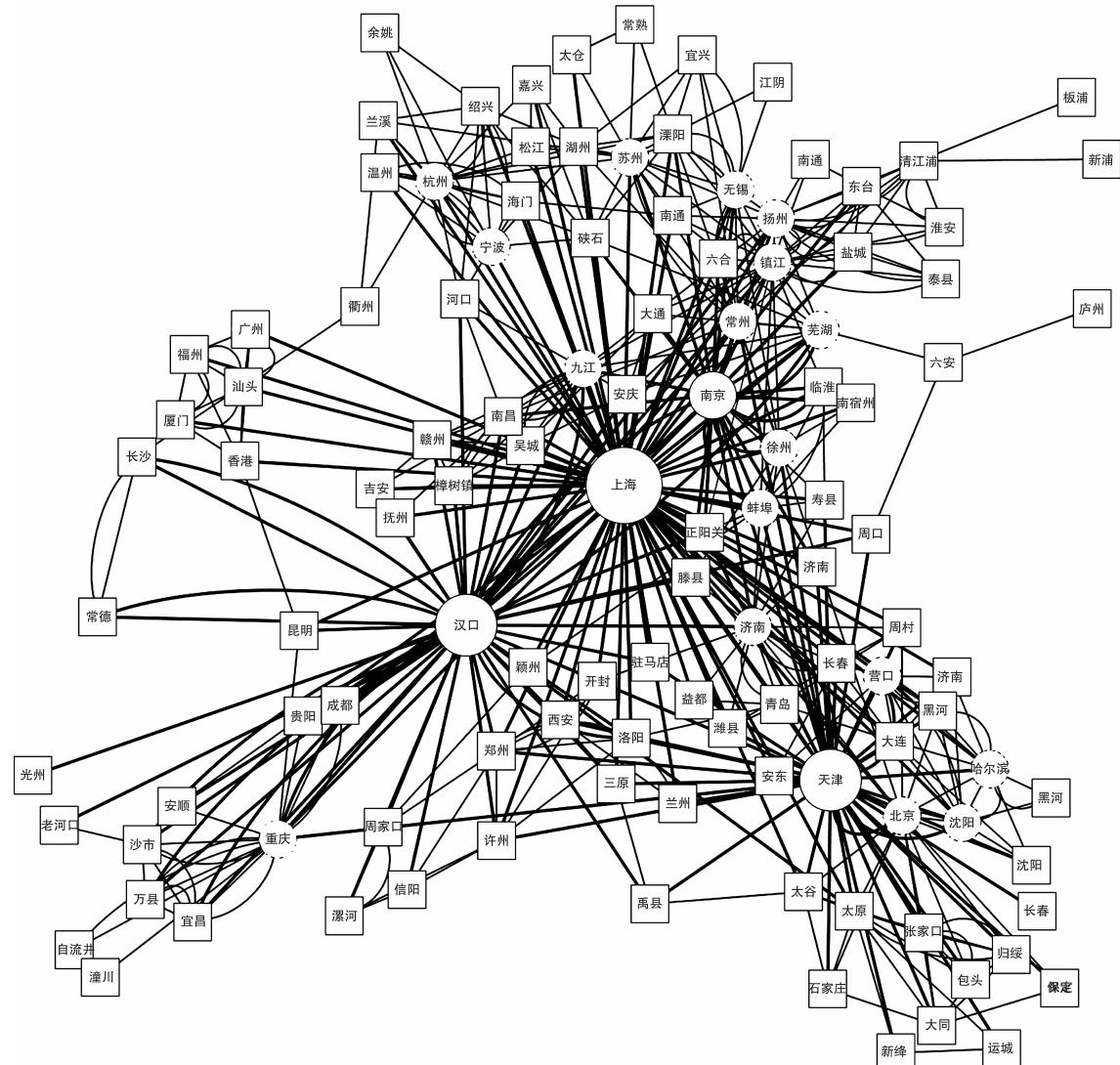


图3 全国重要商埠直接汇兑网络

区域金融圈表现明显，华北以天津为中心，长江中上游以汉口为中心，南京^①为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心点。镇江、扬州为长三角的中心地带。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空间距离极大地影响全国的汇兑关系，长距离汇兑关系还较少。全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和传递性还是以区域为中心的。

五、结语

金融市场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联，形影不离。商品流通和交易常伴随并依赖于资金的融通。内汇作为集汇兑、结算、信贷为一体的埠际资金调拨方式，是旧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汇兑网络错综复杂，只要有货物运输、商贸往来的商埠，即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文章通过对全国重要商埠的直接汇兌行市、直接通汇区域以及转汇中心等主要汇兌关系的梳理，大体描述

^① “以直接汇兌行市”为基础形成的汇兌层级体系即图2中，南京处于次级汇兌中心，各地对其所开的直接汇兌行市并不多。而“以商埠之间的汇兌关系往来”为基础形成的汇兌网络即图3中，南京处于仅次于汉口和天津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汇兌中心。原因在于，南京政府时期，南京作为政治中心，各地与南京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较为密切。但从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讲，这一时期的南京并不一定是金融汇兌结算中心。同理可解释图2、图3中所示汇兌中心有所差异的几个商埠。图3中的扬州、沈阳、九江、营口为与周边商埠发生经济往来关系较多的商埠。图2中的绍兴、青岛、长沙、沙市是汇兌结算中心。

和绘制了国内汇兑层级体系。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中国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心点，通过连接天津、汉口、镇江、杭州、香港等一级汇兑中心，并以这些一级汇兑中心为节点，扩散和连接次级汇兑商埠及基层商埠，覆盖全国的立体型、层级型的一个树状纵向结构。同时，国内汇兑是基于埠际商贸活动流通基础上的资金结算、汇兑形式，各个地方商埠彼此间的商品业务往来，亦会带来汇兑关系的横向连接。汇兑体系的横向纵向连接，形成了复杂的全国汇兑网络。近代中国的区域金融圈表现明显，空间距离极大地影响全国的汇兑关系，长距离汇兑关系还较少。全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和传递性还是以区域为中心的。多层次、立体型的资金调拨网络，使国内贸易通货圈之间连环相扣，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地域间经济联系和金融流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研究近代金融市场圈形成和构造的一个视角。

宏观的汇兑网络只是金融市场圈的一个子集，是近代金融市场圈构建中的一个表现手法。而汇兑机关在全国汇兑区域的深浅广度又是汇兑网络需要细化和完善的内容。即汇兑机构的分布范围，类型构成及业务数量，都是这个复杂网络的构成要素，汇兑网络可以通过细化各大银行和钱庄在全国各地的通汇处、分行号、代理处分布范围及业务数量来衡量其金融势力的地区分布和密度。它们是分析这个汇兑网络层次均衡性和分布密度的有力证据，也是研究汇兑网络需要完善和细化的内容。

Financial Market Circles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1920s to 1930s with Analysis of an Exchange Hierarchy

Ma Jianhu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a market network system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helped the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economy to an open market one. In a traditional economy, financial agents were often involved in circulation of goods. Scholars see also a multi-class hierarchy in China's market system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uch a market hierarchy. Meanwhile, there was interplay between market hierarchy and financial agents. There was also financial structure hierarchy in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raditional China, financial transactions had to cope with different money systems for different businesses. So, currency conversion was a key area for financial agents to handle for example domestic remittances and trade transactions clearance. Such financial services were entwined with commodity trade, domestic or foreign.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in conjunction with commodity trade flows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growth of Shanghai as China's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center.

Key Words: Domestic Exchange; Exchange Center; Exchange Level; Exchange Network

(责任编辑:王小嘉)